

三录之维，不为忘却

——记第二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研究”

黄蓉

《文心雕龙》有言，“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忆往、悔过、对谈大可一时起兴，不问因缘，遂成旧事。以上三者本自暗合人之天性，以抗遗忘，但行动总有始终，无论如何规模，终归寂静。而一旦落于笔头，依托文字，往日琐屑，摇身一变，可为经典。后人遇之，能有“日日新”之感，带出“又日新”之思。寥寥数言，不能囊括三录（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之起意、成文、价值等。因此，11月20日—22日，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文化资本创新团队、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二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广邀国内外嘉宾逾60人，共会京城，畅话三录。

回忆之真假辨

回忆录研究是本次会议最受关注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回忆录悠久的写作历史和浩瀚的文本资料，更源于回忆录所蕴含的独特史学价值。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主题发言中，以《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为题眼，探讨回忆真实、回忆权利及回忆价值等问题，提出“忏悔不可求于人，事实必须公诸世”的原则，认为回忆的真实性应指向如实反映个体记忆之上。秦教授尤其指出，即便回忆无法完全排除前见，但片面之中也能隐藏深刻，复数的声音和多元的视角可以抵抗偏见可能引发的暴政。

回忆录之真假流变是与会嘉宾讨论的重点。围绕如何判定回忆材料真假一题，中

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赵白生倡导求证，认为需引入第三方翔实材料以判定文本之真实性。燕山大学朱旭晨教授则分析了《蒋碧薇回忆录》，倡导以互文式阅读来甄别各版本回忆录的价值。来自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也赞同旁证取证，强调亲历者回忆录虽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史料价值，但在具体使用时仍需仔细甄别。北京大学博士生郑春光研究回忆录和小说的模糊界限，借《堂吉珂德》中潘沙的盆盔之说，指出回忆录同时拥有真实和虚构两大维度。

回忆录之历史价值固然可贵，但回忆录之文学价值却令其脱颖而出，与一般历史文本区分。西南大学教授罗益民便从回忆录的本体特征出发，几经升华，探讨回忆录在哲学、审美、教育、认知等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对外经贸大学邹兰芳教授别出心裁，比较同一作家的回忆录及自传作品，凸显二者在事实呈现、书写视角和成书价值等方面的异同。中国政法大学的潘珊老师则从叙述视角出发，以拉什迪《约瑟夫·安东》为例，解析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如何建构传主的个人形象。首都师范大学的吴康茹副教授则从文类意识出发，讨论索尔莱斯的回忆录，说明回忆录撰写的小说化倾向、选择性聚焦和多重自我交叉等叙述特点。

对回忆录之史学属性与文学属性孰轻孰重仍有分歧，但对回忆录价值的认可并无争论。宁波大学教授钱茂伟便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将回忆录作为“小历史书写”，认为个人回忆书写的兴盛将构成大历史的重要篇章。河南大学的薛玉凤教授依自身经历写就《剑桥日记》，图文并茂，充分展现回忆书写的可能性。吉林大学的宁欣副教授则着眼于回忆录的治愈功能，展开跨学科研究，从心理、文化、认知等角度阅读回忆录。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宏图老师则从传主执笔、旁观视角和编辑辑录三个角度，从回忆录制作、出版、发行等方面探寻回忆录价值。

有关回忆录的理论建构高瞻远瞩，其个案研究也是丰富多彩。荆楚理工学院教授全展比较贾植芳与钱理群的两部回忆录，分析其悼亡追忆的意识和直面历史的勇气，指出二者呈现出一段知识分子荡气回肠的精神历史。安阳师范学院的代学田老师分析恩古几回忆录，梳理作者如何在书中见微知著，将自我成长与家国际遇、非洲图景联系。来自人民大学的冯欣则翔实解读福楼拜回忆录，指出其创作维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李世琦先生也和与会者分享了自身独特的回忆录阅读经验。

忏悔之意识说

在西方，奥古斯丁、卢梭等人的《忏悔录》已成经典，世代相传；反观东方，似

乎缺乏如此蔚为大观的忏悔文类。赵白生教授在其主题发言中，一针见血指出，与西方相比，忏悔文化在中国并不发达。中西之间，似乎有避讳文化与忏悔文化的对立之势。但是，赵教授转而点明，追本溯源，中国的忏悔意识在《论语》中业已形成。孔子勇于悔错，不避己过之精神是成就其文化宗源地位的关键。最后，赵教授提出，可以从宗教、体制和文化三大维度，探讨忏悔录的成书及忏悔意识之形成。

鉴于中西文化差异，对忏悔意识的解析成为忏悔录讨论一大亮点。北京大学教授李政研究古赫梯国王祝祷文，赞赏赫梯国王与神明的坦率交流，以自我批评的悔罪祈求神之谅解，从神人关系、自我建构和忏悔行为几大角度，解析祷文中出现的忏悔意识，提出可以将祷文视作早期忏悔录形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江博士及中国药科大学张国申教授则以小见大，从《富兰克林自传》中读出作者的忏悔内容，提出忏悔之职业身份维度。中国药科大学李朋老师则反其道而行，以孟子的“可欲之谓善”，解析道德深层的人性基础。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焦晶老师则将文学与科技结合，运用分析软件，对奥古斯丁《忏悔录》进行语料统计分析，以定量而定性，探究母子关系对奥古斯丁的影响。

比较中西忏悔意识，由之切入中西文化命脉是忏悔录研究的重要方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许德金教授比较卢梭与巴金的忏悔作品，着重分析其中忏悔意识，认为对忏悔对象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二人忏悔录的写作。云南大学教授张维对比中西，认为相对于西方忏悔录对真实性的追求，中国作品中“无意失真”和“有意作伪”的倾向令人遗憾。中西互映，取长补短，是在比较视野中进行忏悔录研究的关键方向。

谈话之地位考

呼朋唤友，围炉夜话，是中国古代文人向往的状态。对话之间各人言辞往来，似乎并无地位差异。但事实也许是，共同使用的语言介质给言谈双方造成了平等的错觉。由此，赵白生教授别开生面，和著名诗人邵燕祥展开了一场“不平等的对话录”。赵教授指出，古今中外，对话二人基本都是不平等关系，如《论语》《柏拉图谈话录》以师者为尊，或是访谈录中以访谈对象为主。故而不平等的谈话录才是真正的谈话录，对话的价值并非来自平等的思想交流，而是不平等的落差之间所产生的势能。邵先生则明确指出，书写的意义在于直面历史，记录的关键旨在保留“个人记忆之原生态”。在邵先生看来，记忆和回忆本身便价值无穷，而“史贵存真”，篡改事实是非虚构作品最大的弱点。虽然事实的细节可以允许虚构的空间，但人性和态度不容混杂，记忆

的良知必须留存。邵先生虽年逾八十，思维不减犀利，其身负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在言谈之间，尽显魅力。

目前，对于谈话录的研究热情并不高涨，但历史上，谈话录作品占据着传记谱系的重要地位。对外经贸大学澳大利亚学者魏乐民（Daniel Vuillermin）研究英国现代传记开山名著《约翰逊传》，解读其中对话，指出传记作品在文类上的不确定性，自传、他传和回忆录之间的疆域由于作品中各种元素的混杂，呈现出并不稳定的文体特征。中国农业大学的钟燕副教授则解读谈话录必读经典《歌德谈话录》，从生态角度出发，探究本书如何解释艺术血统关系，并预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

传学之深调研

三录漫谈，终归传学。对回忆录、忏悔录和对话录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传学一门大系。因此，本次会议延续往年传统，特别开辟传学理论、文类和作品研究分会场。与会学者围绕传记文学这一类目，从多方面展开论述。

自传研究历来是传学研究的机要重镇。本次大会特邀来自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斯莫林斯基（Reiner Smolinski）教授进行主题发言，斯莫林斯基教授从科顿·马瑟和富兰克林的两本自传出发，认为二者分别代表美国早期精神中的内化和外省维度，前者认为自我之力无法达到救赎之境，后者则相信自身行动蕴含改变之可能。二者互相竞争，互为补充，对美国精神、国民性、政治架构、法治思维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斯秧副教授则以隐士为关键词，对比陶渊明与蒙田的自传写作特点，指出二者之隐虽有细微差别，但都指向自然、人性的生存方式，强调存在之另一种可能。

自我的形象构建依旧是众人关注的主题。北京大学郝田虎教授分析马丁·贝尔纳回忆录，从人生经历、学术理路、政治立场、自我形塑、致敬之意、读者期待等角度，考察贝尔纳缘何以赛义德为镜，塑造自身形象。吉林大学的金铨副教授关注集体形象的构建，分析普罗米修斯“革命者”和“创造者”之双重身份如何进入英国浪漫派作家笔下，成为其自我隐喻的关键一环。北京大学博士张文茹则细读帕特里克·怀特自传，从民族、阶层、性别三大核心维度，探讨传主身份建构的困境与突破。北京大学博士尚云英则结合维多利亚时代背景，分析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穆勒和约翰·罗斯金三大名家之自传，剖析其各自形象与所处时代亦合亦开的复杂关系。

传学建构，重在理论。本次会议上，理论层面的探寻成果丰富。江苏师范大学王

成军教授着眼现代及后现代自传文本，指出菲利普·勒热讷所谓传记求真的僵化“自传契约”已无法满足当代传记批评的需要，而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新自传契约”则更适应传记的文体学研究，尤其是文类本体性构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邵雪萍老师选择小泉八云的《莎士比亚评传》，展现与一般传记写作中客观评析语调不同的个人化评传视角。大连理工大学的罗贤娟提出，传记是对存在者的解蔽，并分别从传记的事件、语言及存在者三个方面解题。南开大学的毛旭则立足传记中的“怪癖书写”，研究怪癖叙写之两面性在传主、读者和作者三处的体现。北京大学的硕士陈俐利和博士黄蓉分别整理了忏悔录和回忆录文献，并各自进行简要综述，梳理了此前研究成果。

诗传结合的讨论是本届传会的一大亮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丹立足中国古典叙事诗，认为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气候未成的背景下，叙事诗能有效修复历史空白，充当经典正史之补充。来自美国圣十字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的郝稷（Ji Hao）副教授则探究杜甫形象在历代传记中的变迁，试图从传记角度解读诗作与诗人的关系。天津财经大学的张慧芳副教授阅读泰德·休斯的诗体自传，对比一般传记呈现的完整叙事之“故事流”与诗体传记之记忆“拼贴画”，阐释诗体自传独特的文体特征。

低调处彰芳华——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二十载

今年是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为此，本次会议特将开幕式设为“我与传会二十年”，邀请十名代表，回顾自己与研究会之因缘际会，坦陈二十年间种种遗憾。发言者中，既有二十载如一日、年年参会、为学会无私奉献之“开山功臣”，也有此后加入的骨干栋梁、新鲜血液。短短五分钟时间，自不能尽言与研究会的点滴回忆。但忆往昔只为争来者，无论银丝学者抑或青丝学人，都对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之未来希冀无穷。

三日传会期间，一切有条不紊，依序推进，再无特别仪式。但二十载之沉淀随处可见。一见会议规格之高，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更基本涵盖国内著名高校之学者；二看会议内容之充实，参会者无论师者学生，提交的论文和发言基本论证充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三观会议过程之流畅，非有此前经验，一个规模如此的会议绝难按部就班，不逾规矩。

闭幕式上，赵白生会长简要总结了过去二十年间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成果：22次会议（包括两次国际会议）、222本出版物、一大批传学研究专家学者、世界范围内的分支机构……简短数语间，二十载记忆呼之欲出，暗合本次会议之三录主题，更指明未来奋斗趋向。

是为记。